

蒙古族源与 元朝帝陵综合研究

第二辑

王 巍 孟松林 主编



科学出版社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

第二辑

王 巍 孟松林 主编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蒙古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的版图曾横跨欧亚大陆，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蒙古民族的起源有多种学说和传说，至今尚无准确定论；蒙古民族的早期发展史也因史料甚少，记载不详，且考古资料零散，从而制约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重要成果，整理汇编了自 20 世纪初以来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源研究方面的论文、著作章节和译文，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历史、考古、语言学等方面对蒙古族起源和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二是关于蒙古族源传说故事的研究，多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三是对原蒙古人室韦-达怛的研究。

本书可供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 第二辑/王巍, 孟松林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03-054809-2

I. ①蒙… II. ①王… ②孟…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②帝王-陵墓-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K281.2 ②9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345 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张 放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0

字数: 710 000

定价: 2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资助出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
综合研究”(批准号 12@ZH014)学术成果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陈奎元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高华 徐光冀 曹永年 蔡美彪

主 编: 王 巍 孟松林

副 主 编: 刘国祥 白劲松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方	王志浩	乌 兰	邓 聪	田广林	史家珍
白丽民	乔 吉	朱 泓	刘正寅	齐东方	齐木德道尔吉
安泳鐸	孙英民	李延祥	李存信	李玉君	何天明
汪立珍	沈睿文	张久和	陈永志	陈星灿	林梅村
杭 侃	周 慧	周力平	宝音德力根	赵志军	袁 靖
夏正楷	高洪才	倪润安	曹建恩	常 海	梁 云
塔 拉	朝 克	魏 坚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二辑)编辑委员会

编辑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 巍 孟松林

执行主编:刘国祥 白劲松

副 主 编:倪润安 高洪才

委 员 (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大方 邓 聪 田广林 闫向东 安泳鐸
朱 泓 齐东方 沈睿文 张久和 陈永志
陈星灿 李玉君 杭 侃 赵志军 袁 靖
曹建恩 塔 拉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二辑)工作组:

组 长:刘国祥 白劲松

副组长:倪润安 孙 莉 高洪才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 苹 王 珏 王 钰 王东风 邢 泰
孙 冰 张 旭 陈桂婷 哈 达 程新华

序

2012年,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ZH01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作为本项目的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作为本项目的实施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呼伦贝尔学院等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协作单位,本项目的立项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

蒙古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鼎盛时期的蒙古帝国的版图曾横跨欧亚大陆,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蒙古民族形成之前,蒙古高原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高车、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室韦等部族。关于蒙古民族的起源有多种学说和传说,至今尚无准确定论;蒙古民族的早期发展史也因史料甚少,记载不详,且考古资料零散,从而制约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元朝历代帝王陵寝的地理方位与规格建置问题则是一道举世瞩目的世界性千古谜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巨大学术缺憾和研究空白。

正因为如此,本项目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采取多学科交叉合作的方式对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研究予以推进。通过在呼伦贝尔地区系统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蒙古族源研究提供系列考古实证资料,并开展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源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确立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作为蒙古族发祥地的重要历史地位,将内蒙古打造成蒙古族源研究的国际学术中心,澄清国际学术界近年关于蒙古族源研究的各种谬说,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鉴于蒙古、日、美等国学者已经对蒙古国境内的三河源地区以及克鲁伦河上、中游进行了拉网式考古调查而未获结果,本项目将充分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在中国境内的克鲁伦河下游至呼伦湖一带开展系统考古调查,以深入推动元朝帝陵的探寻与研究工作。

本项目以科学构建蒙古史前史为主要学术目标,系统阐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的蒙古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早期历史,揭示森林草原民族崛起的原因、机制、特点及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本项目的研究极具世界影响力,有着十分显著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近年通过对呼伦贝尔地区开展系统考古调查和发掘,在大兴安岭林区和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已经寻找到并确认了与蒙古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相关的考古遗存,如黄火地祭祀遗址、奇乾半地穴式居住址、蘑菇山鲜卑墓地、海拉斯图鲜卑墓地、谢尔塔拉室韦墓地、西乌珠尔室韦墓地、岗嘎室韦墓地、蒙古先人岩画遗存等。其中,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学术成果,墓主人多为屈肢葬,以独木棺为主要葬具,随葬一批具有典型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骑射用具等,其年代为公元9~10世纪,为蒙古族起源研究提供了最新考古实证。第二,通过开展考古学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科学地构建蒙古史前史的框架,推动中国蒙古学的发展,夯实中国蒙古学的研究基础,从而为世界蒙古学的研究开创新的局面。利用考古实证材料和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确立中国呼伦贝尔地区作为蒙古民族起源之地,对于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通过本项目的深入研究,科学阐释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蒙古民族所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蒙古民族所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将极大地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与特征,客观揭示蒙古民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贡献,对于维护当今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将发挥积极作用。第四,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及系列研究成果的出版,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确立中国在研究蒙古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方面的主导地位。在完成该项目的同时,将内蒙古自治区,特别是呼伦贝尔市打造成蒙古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国际学术中心之一。第五,以蒙古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突破性成果,确立森林草原民族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动因和机制,传承与弘扬蒙古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和展示森林草原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宣传与普及蒙古族的历史科学知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陵寝文化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核心内容。元朝陵寝是中国古代陵寝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性。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以深化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理解与认识,从而有助于维护新形势下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于元朝帝陵的探寻,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蒙古族与我国古代的契丹等族一样,都有归葬祖塋之俗。而其祖塋,应向其始兴之地求之。如三河之源不儿罕·合勒敦山一带,或是克鲁伦河一带,如《黑鞑事略》等书所记,就在这一地域。如果《元史》所载安葬蒙古大汗及元朝诸帝的起辇谷就是怯绿连河(克鲁伦河)的异译或异写的话,则《元史》所载的起辇谷、《蒙古秘史》和《史集》所载的不儿罕·合勒敦山并无多大矛盾,其地望大而言之,都在克鲁伦河流域。既然蒙古、日、美等国的考古学家已经对蒙古国境内的三河源地区以及克鲁伦河上、中游一带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而未获任何结果,而中国境内的克鲁伦河下游至呼伦湖一带就应该成为探寻元朝帝陵的重点区域。

在过去的五年里,项目组对呼伦贝尔地区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编辑、出版了《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研究》，共三辑，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不仅集中展示了呼伦贝尔地区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对于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接下来，我们需要扩大与本项目研究课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范围，搭建一个新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通过陆续编辑和出版《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辑刊，将该项目研究持续推向深入，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新成果。

王 巍 孟松林

2017年10月

前言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二辑以蒙古族源研究为主题，整理汇编了自20世纪初以来以中文形式发表的部分论文、著作章节和译文。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从历史、语言等方面对蒙古族起源和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的研究；二是关于蒙古族源传说故事的研究；三是对原蒙古人室韦-达怛的研究。

关于蒙古族族源，主要有东胡说、突厥说、匈奴说、吐蕃说、丁零说等说法。吐蕃说，较为完整而又最先提出是在约成书于明末的《蒙古黄金史纲》，清代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进一步发挥。此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用佛教经典和西藏神话来附会蒙古族族源，材料不实，难以为信。丁零说的提出者是今人苏日巴达拉哈，代表作是《蒙古族源新考》，因缺少较有力的证据，信守者不多。流传时间长、影响广泛的是前三种说法，均始于南宋，以东胡说为最早。

东胡说的提出，源于将蒙古族源与东胡后裔蒙兀室韦相联系。最早提出者是南宋初期洪皓的《松漠纪闻》，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滕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清代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认为“蒙古人之祖先实出于靺鞨”，实与此一致。清末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以蒙兀室韦和室韦蒙瓦为据，认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沈曾植《蒙古源流证》从语言考证，认为蒙古语和鲜卑语相差无几。王国维《蒙古考》考证了蒙古与蒙兀室韦的族源关系。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一书将乌桓、鲜卑、契丹都划为蒙古语族，属于东胡语族后裔。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系统梳理和分析了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资料，否定了匈奴人和蒙古人同源的观点，进一步证明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东胡后裔室韦-达怛人。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一文认为蒙兀室韦属于契丹系统，语言和契丹相类，而服饰、辫发和使用“角弓”的风俗习惯和鲜卑相同，而且鲜卑与室韦的活动地区相同，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属于东胡族系。在国外，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放弃了原持的匈奴说，改为东胡说。苏联学者维克托罗娃在《蒙古人》一书中提出：古代蒙古民族历史的新阶段同东胡人是分不开的，这些东胡人可以被看作是晚近蒙古人的直接民族先世。蒙古国学者苏赫巴特尔在《论蒙古民族起源》一文中也研究得出蒙古族源与东胡、鲜卑有关，认为拓跋鲜卑应是蒙古人祖先。法国学者韩百诗、美国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等也认同东胡说。

主突厥说者，南宋赵珙的《蒙鞑备录》、清朝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民国柯劭忞的《新元史》以及波斯拉施特的《史集》等，均为其代表。其中《史集》详细叙述了14世纪

以前蒙古各部的起源和分支情况，并把他们归为突厥系。1889年，俄国人雅德林采夫带领考察队在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古突厥碑铭《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此后突厥碑铭资料便成为部分学者持突厥说的重要依据。外国学者多桑、霍渥斯，中国学者岑仲勉、冯家昇等也主突厥说。

匈奴说之始略晚于突厥说。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中记述“黑鞑之国号大蒙古”，同时代人徐霆疏证曰“即北单于国”，单于国就是匈奴。俄国蒙古学、东方学的奠基人雅琴夫·俾丘林在其翻译出版的《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编》中认为“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时族名”。白鸟库吉曾一度持有匈奴说。中国学者方壮猷、黄文弼、佟柱臣、谢再善等也持此说。匈奴说在蒙古国学术界影响很大，策·道尔吉苏荣、纳·热西扎木苏等均持此说。

突厥说、匈奴说都曾流行于国际蒙古学界，成为当时蒙古族起源研究的主流观点。但随着反映蒙古早期历史的汉文史料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以及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经过多年的讨论，东胡说日益深入人心。此外，蒙古族源混合说又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新趋势，并逐渐接受混合的基础是以东胡说为主导。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轻根，他在《蒙古种族考》一文中认为蒙古是由室韦、突厥、吐蕃三种人混合之种族。张振之《蒙古种族是哪里来的》认为唐以前没有蒙古族，唐以后塞外各族相互往来，互相同化，产生了蒙古民族。邵循正《蒙古的名称渊源》一文也认为蒙古是室韦和突厥的混合部落。孙进己认为蒙古民族是由蒙古高原上先后活动于此的许多民族的成分逐渐混合、融合而成，蒙古王族或所谓纯洁的蒙古诸部起源于蒙兀室韦，而其他普通的蒙古部则起源于其他室韦部落，后来蒙古族又融入了许多非室韦系的部族。易华《蒙古族源：人类学透视》一文认为构成蒙古族基础的原蒙古人可以通过室韦、靺鞨追溯到鲜卑、东胡，大体上属于蒙古人种，而另一部分蒙古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体上源于印欧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从鲜卑—室韦—蒙古的演变脉络追寻和考察蒙古族起源过程的考古学证据，正是对东胡说的回应与验证。从这方面考虑，《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辑主要收录了王国维、亦邻真、林幹、郑英德、陈得芝、孟广耀等东胡说观点的论著，以及张振之、邵循正、孙进己等混合说观点的论文；另外，还收录了一些从语言学、地理学和社会历史发展等角度探讨蒙古族起源的论文。

关于蒙古族源，还流传着一些传说故事，皆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有的学者认为蒙古族的先民根本没有“图腾崇拜”一说，所谓的“狼鹿图腾”只是后人根据一些神话传说的推测，是人们的主观臆造。有的学者认为，蒙古族先民是由古代的氏族集团演化而来，传承了本氏族先人的狼、鹿、鹰、熊、天鹅、树木等图腾崇拜，并且至今仍在蒙古族一些部落的民间流传。《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辑收录的这方面主题的论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狼图腾、鸟图腾、树图腾等崇拜，特别是狼图腾，来探讨蒙古与

突厥民族的历史关系和文化联系,并指出这两个民族图腾族源传说的共同核心在于萨满教的苍天崇拜观念。另一类是通过熊崇拜、天鹅仙女神话等来探讨蒙古族与满-通古斯语族的文化相似性,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强调祖先与天神之间的关系,标榜氏族起源的神圣性。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二辑专门收录了对原蒙古人室韦-达怛的有关研究。在鲜卑人迁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内地以后,北魏时期在东胡故地居住的主要有契丹人和室韦人。对室韦这一族称,伯希和曾提出“此名(鲜卑)代表之原文,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室韦还有另一个名称达怛(靺鞨),二者在汉籍中可以互通互易,可合称为室韦-达怛人。他们是原蒙古人,语言还没有经历后来的突厥化历史过程,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的特点。唐代是室韦-达怛人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回鹘西迁和契丹远征外蒙古高原,给室韦-达怛人提供了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机会。蒙古高原各部在《辽史》中被称为阻卜,也写作术不姑。这是契丹人对蒙古高原各部的总称。女真人沿袭了这个称谓,《金史》中作阻鞑。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

中外史学界对室韦、达怛(靺鞨)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国外研究中,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有深度。在室韦问题上,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为代表。1910年,白鸟库吉发表《东胡民族考》,内有《失韦考》一节,主要运用语言对音方法,对室韦的部落、地理、官职诸名称等作了考证。同年,津田左右吉发表《室韦考》一文,主要就《魏书》、《隋书》和两《唐书》记载的室韦部落的地理分布及前后室韦部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919年,白鸟库吉又作《室韦考》一文,系统地考述了自后魏至辽代的室韦历史,摒弃了《东胡民族考·失韦考》中的许多观点,重新提出一些看法。在达怛(靺鞨)问题上,箭内互《靺鞨考》、前田直典《十世纪的九族靺鞨》等影响较大。

国内研究方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个研究室韦、靺鞨、阻卜的高潮,发表了一批论文,如吴廷燮《室韦考略》(1922年)、王国维《靺鞨考》和《黑车子室韦考》(1928年)、方壮猷《室韦考》(1931年)和《靺鞨起源考》(1932年)、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1939年)等。王国维《靺鞨考》一文认为《辽史》之阻卜及《金史》之阻鞑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靺鞨,并就阻卜一词的来历提出一个假说:阻鞑二字乃靺鞨二字之倒误,后又省作阻卜。这些观点影响较大,既得到较多认同,也引起徐炳昶《阻卜非靺鞨辨》(1930年)、王静如《论阻卜与靺鞨》(1932年)的反驳。1952年,蔡美彪发表《辽金石刻中的“靺鞨”》一文,根据从《辽道宗哀册》中发现的有关靺鞨的文字,与《辽史》道宗一朝阻卜叛乱的史实相比勘,证明《辽史》所称阻卜正是《道宗哀册》所称靺鞨。至此,王国维力倡的阻卜即靺鞨说基本上成为定论。1957年,岑仲勉发表《达怛问题》一文,对达怛名称含义、族属、三十姓达怛、九姓达怛、阴山达怛、黑靺鞨、白达达等进行全面论述,史料收集颇为详备。20世纪70年代以来,室韦、靺鞨、阻卜的研究又获得较

大进展，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轮新高潮。突出的特点是积极参与讨论的学者明显增多，发表的论文大幅增长，论题涉及范围广泛，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更趋细化、深入，加强了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从而在一些纠葛不清的问题上有所突破。

总之，通过对蒙古族源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我们基本了解了学术发展历程、当前研究的进展状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研究趋势和发展方向。现从百年来研究的众多论文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汇总在《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第一、二辑之中（为了保持原文语境，文中地名保留原样）。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仍希冀可为本项目的深入开展和学术界的继续讨论提供较完备的资料基础。

刘国祥 白劲松 倪润安

2017 年 10 月

目 录

序.....	王 巍 孟松林 (i)
前言.....	刘国祥 白劲松 倪润安 (v)

室韦-达怛研究概况	张久和 (1)
室韦考.....	〔日〕津田左右吉 著 王国维 译 (6)
室韦考.....	〔日〕白鸟库吉 (12)
室韦考.....	方壮猷 (94)
试论室韦诸部都是蒙古族源.....	刘光胜 郑英德 (136)
室韦的族源和各部方位.....	王 颀 (145)
室韦及其先人和我国各族的关系	孙进己 (156)
室韦诸族的源流	孙进己 (164)
室韦族源问题之管见	王德厚 (184)
室韦族的族源	李德山 (189)
室韦民族共同体类型	冯继钦 (197)
室韦的冶铁问题	冯继钦 (205)
关于室韦语言的几个问题.....	张久和 (211)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 (218)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

靺鞨考.....	〔日〕箭内互 著 王国维 译 (233)
靺鞨考.....	王国维 (246)
论阻卜与靺鞨	王静如 (251)
靺鞨起源考	方壮猷 (255)
辽金北边部族考	冯承钧 (265)
十世纪的九族达靼	〔日〕前田直典 著 辛德勇 译 (273)

辽金石刻中的“靺鞨”	蔡美彪 (294)
达怛问题	岑仲勉 (304)
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	陈得芝 (332)
靺鞨杂考	周良霄 (342)
阻卜考	余大钧 (354)
术不姑考	孟广耀 (383)
靺鞨起源及其去向管见	王金炉 (390)
有关达靺族属的若干问题	周良霄 (398)
关于达怛的名称、族属问题	张久和 (408)
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刘迎胜 (420)
再论阻卜与靺鞨	刘浦江 (426)
汪古的族源	周清澍 (443)
后记	(463)

室韦-达怛研究概况

张久和

室韦-达怛史是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就目前来看,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室韦是北朝至辽金时期见诸汉文献记载的北方民族。达怛一名最早见于突厥文碑铭,是突厥语族部落对室韦人的又一泛称,唐后期为中原人沿用。室韦-达怛同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后唐、后周、北宋等中原政权以及北方草原的突厥、回纥、黠戛斯、沙陀、党项、吐浑、契丹、女真等族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在北方民族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室韦-达怛中,语言属于东胡-鲜卑后裔诸语言的部落占主要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室韦名下囊括的鲜卑后裔部落,由于达怛、阻卜等名称的相继出现而逐步减少,达怛的涵盖范围则逐渐扩大,一些非室韦系部落或与室韦部落有密切关系的其他部落,也自称或被称作达怛。

从北朝到辽金,室韦-达怛在历史上的活动时间长,交往的部族多,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原政权及邻近各族的历史都有影响。尤其是后来,大部分室韦-达怛部落成为蒙古族的组成部分,所以,研究室韦-达怛史,对探索蒙古族族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外史学界对室韦、达怛进行了为期不短的研究。不同时期的中外学者,依据文献记载,从不同的研究角度,采取各自的方法,对室韦、达怛的历史进行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就。开始注意古代北亚民族历史的,是西方传教士。法国耶稣会士刘应在17~18世纪写了《大鞑靼史》(1780年才得以出版),法国学者德金写了《匈奴、突厥、蒙古和其他西方鞑靼人的通史》(1756~1758)。俄国传教士夏真特出版了《古代中亚各族资料选集》三卷(1851),介绍了北方民族的传记材料。到了20世纪,研究北方民族的学者人数增多了,有的学者取得很大成绩。如伯希和提出室韦就是鲜卑的同名异译^[1],“昔之鲜卑,即唐宋时之室韦”^[2]。这是学术价值很高的研究成果。国外对室韦、达怛的研究,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有深度。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白鸟库吉。1910年,白鸟发表了《东胡民族考》^[3],内有《失韦考》一节。他主要运用语言对音方法,对室韦的部落名称、地理名称、官职名称等作了考证。今天看来,白鸟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不科学性,结论也多有不可取之处。1915年,松井作《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4],认为可敦城在额济纳河一带,将阻卜放在了甘肃西北至贺兰山一带,这显然是错误的。同年,津田左右吉发表了较有影响

的《室韦考》一文^[5]，主要就《魏书》、《隋书》和两《唐书》记载的室韦部落的地理分布及前后室韦部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看法。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谬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津田对《旧唐书·室韦传》进行史料辨析的方法和态度是可取的。到1919年，白鸟又作《室韦考》一文^[6]，系统地考述了自后魏至辽代的室韦历史，包括不同时代的室韦地域、部落演变、部落名称起源、语言和室韦与达怛的关系、达怛与阻卜的关系等内容，其中达怛、阻卜内容约占全文的七分之一。在《室韦考》中，白鸟摒弃了《东胡民族考·失韦考》中的许多观点，重新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不乏赞同采用津田之说的地方。与《东胡民族考·失韦考》相比，虽然《室韦考》中难免有许多错误，尤其是使用汉语译名材料与民族语言进行随意比对而推导出了许多错误结论，但也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的意见。白鸟的《室韦考》是研究室韦-达怛史应该注意参考的一篇文稿。遗憾的是，我们多吸收了《东胡民族考》的观点，而忽略了对《室韦考》的借鉴。随后，白鸟的《塞外民族》一文^[7]，也对室韦、达怛、塔塔儿、阻卜专设一节，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在达怛问题上，1918年，箭内互发表《靺鞨考》一文^[8]，就阴山达怛、兴安岭西达怛、敌烈与达怛、阻卜与达怛、黑达怛与白达怛等作了论述。1937年，小野川秀美的《汪古部的另一解释》一文发表^[9]，其中对《王延德使高昌记》所载的九族达怛，提出了应属羌系部落的意见。十多年后，前田直典在《十世纪时代的九族达靺》^[10]一文中，对小野文中的许多说法提出了质疑。前田这篇文章对“九族达靺”的族属、地域、与突厥文碑中九姓达怛的关系、九姓与《辽史》记载的阻卜的关系等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他认为，“九族达靺”的前身是8世纪游牧于色楞格河下游至东边鄂嫩河一带达怛中最进步的部落——九姓达靺。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衰亡后，九姓达怛乘机南下占据了鄂尔浑河流域。10世纪初，辽人所记鄂尔浑河流域最强大的阻卜就是“九族达靺”。前田对九姓达怛的研究是有深度的，影响也较大。

中国对室韦、达怛问题的研究，也开始于20世纪初期。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些著述家主要是舆地学家，如何秋涛、丁谦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室韦的地理分布有所考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室韦、达怛、阻卜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发表了一批有质量的文章。如吴廷燮的《室韦考略》（1922）^[11]，王国维的《靺鞨考》和《黑车子室韦考》（1928）^[12]，方壮猷的《室韦考》（1931）和《靺鞨起源考》（1932）^[13]，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1939）^[14]等。这些文章论及的主要内容，有室韦、达怛的来源，室韦与达怛、达怛与阻卜的关系，阻卜与克烈等部的关系，室韦的地域，阻卜的名称等。这一阶段对室韦的研究不如对达怛的深入。在达怛研究方面，贡献较大的是王国维和方壮猷。在王国维之前，中外学者如沈曾植、箭内互、白鸟库吉等提出和简单论证了阻卜是广义达怛异称的观点。王国维通过对比史料，详细论证了达怛即阻卜这一论点。由此引发了达怛与阻卜关系的一场论战。徐炳昶作《阻卜非靺鞨辨》（1930）^[15]，反对王国维达怛即阻卜说，王静如著《论